

广州市物价讨论会 文稿汇编

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广州市物价局

说 明

今年十月召开的广州市物价讨论会，是由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广州市物价局共同发起、组织的。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各有关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和从事价格研究的理论工作者。

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共同研究物价问题，探讨保持我市物价基本稳定的近期或长远的可能措施，这在我市只是一个开端。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市的物价问题，我们把这次讨论会的部分文稿汇编成册，作为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既然是讨论会，就难免有不同意见，因此，《汇编》把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稿尽可能地编入。但限于篇幅，还有部分文稿未编入；又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汇编》会有错漏，敬请同志们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广州市物价讨论会纪要

.....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整理(1)

按照十二大文件精神,解决广州市物价 水平过高的问题

.....暨南大学 陈肇斌(14)

试论稳定广州市场物价的基本途径

.....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综合处(28)

从货币供应状况看广州市物价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市分行

.....黄树斌 黄祐楨 刘懿徽(39)

广州市侨汇的发展和市场物价的关系

.....中国银行珠江分行(53)

对若干种副食品价格的探讨

.....广州市第二商业局 何良(59)

关于议购议销价格的几个问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李克华(72)

关于我市猪禽蛋鱼价格问题的一些看法

.....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财农处(88)

关于广州市副食品市场价格问题的探讨

.....广州市物价局理论学习小组(97)

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稳定市场物价

.....广州市郊区人民政府 周升海(108)

农产品价格的几个问题

.....魏双凤(119)

稳定广州市场物价刍议

.....广州市财贸干部学校 何正(127)

关于香大蕉价格中存在问题与对策的探讨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杨玉琪 卢洁峰(134)

我市副食品出口与内贸市场的价格关系

.....广州市外贸局商情物价科(141)

关于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管理问题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科(149)

谈谈价格补贴的若干政策问题

.....广州市财政局财政研究室(161)

建国以来广州市零售物价变动情况

.....广州市统计局 梁崇奎(168)

广州市物价讨论会纪要

中共广州市委研究室整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

广州市物价讨论会，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参加讨论会的有市属有关业务局主管物价工作的同志，和省、市从事价格理论工作的教授及研究人员，共四十七人。

这次讨论会的重点是分析和探讨广州市副食品的价格问题。提交讨论会的文稿共有二十八篇。讨论会上，与会同志比较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广州市物价的状况，探讨了形成物价上涨的原因，并提出了不少稳定物价的具体建议。

广州物价高的状况和原因

(一)与会同志从各方面分析了广州市物价的状况。

近几年来，广州市物价上升幅度大。据统计，全市零售物价总指数（牌、议、市价平均）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八年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这不仅超过了经济困难时期的上升幅度（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升百分之二十三点八），也超过了全省、全国物价上升的幅度（广东省上升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全国上升百分之十一点一）。

大家认为，虽然广州市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较大，但考察广州的物价，不能仅看物价总水平，“全国之冠”只是笼统的

平均数的概念，还要做具体分析：

1、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比其它城市高。在零售商品中粮油销售价格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日用工业品的价格有升有降，总水平变动不大，某些日用工业品的价格还低于其它城市。

2、牌价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并不比其它城市高。一九八一年与一九七八年比较，牌价指数广州上升百分之八点三，天津上升六点九，沈阳上升七点九，武汉上升八点三，重庆上升九点五。

3、广州物价问题突出表现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牌价比重比其它城市小，议价比重大，牌、议、市价的差距大。一九八一年供应居民的牌价商品只占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五，议价商品占二十一点八，市价占六点七。议价商品价格平均比牌价高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市价平均比牌价高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七。而其他城市牌价商品比重则占绝对优势。如上海牌价商品占百分之九十六点六，议价只有一点七，市价也只占一点七。天津、北京也大体如此。如果以三年来广州市场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作为一百，来分析各类价格对物价总指数上涨的影响程度，就可以看出，牌价商品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七，议价商品占五十七点五四，市价占十七点零六。也就是说，议价和市价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影响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的主要因素。

4、物价上涨主要是副食品的上涨幅度大，其中，猪、禽、蛋、鱼尤为突出。这几种主要副食品，除猪肉牌价供应较充足外，鲜瘦肉、禽、蛋、鱼则经常是有价无货。而议、市价的销量大幅度上升，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了一点六三倍。议、市价的比重，猪肉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三鸟占九十二点五，蛋品占四十七点二，水产品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四，牛肉除了牌价定量供应回民外，全部为议、市价。同时，牌议市

价的差距很大。一九八一年猪肉的议、市价分别比牌价高出十二点一和五十六点二，鸡高出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和七十五点四，蛋品高出百分之三十五和三十五点八，鲮鱼高出一二倍和一点五倍。

5、广州市居民消费中，吃的商品比重大，因而影响居民的生活也大。根据市统计局一九八一年职工家计调查的资料，平均每月每人用于吃的商品支出占全部商品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三（全国平均为六十一·六，北京为六十三，天津为六十，武汉为六十一，西安为五十八）。在吃的商品中，粮油是牌价定量供应，因而集中在肉、禽、蛋、鱼、菜等副食品上，约占吃的支出的三分之二。在这部分支出中，购买议、市价商品的支出又占了一半。一方面广州市居民对副食品需求量大，加剧了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影响了居民生活。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八年职工平均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二。按每个职工平均负担的人口折算，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八年每月多支出生活费十七·二五元，减除国家补贴的五元，仍多支出十二·二五元。

综上所述，广州市的物价问题，突出的反映在副食品的价格水平畸形偏高。而副食品中，又集中在猪、禽、蛋、鱼等主要副食品上。这几种主要副食品价格高，集中表现为：牌价供应少，议价比重大，价格差距大。因此，要控制广州市的副食品价格，必须在尽可能扩大牌价货源的同时，突出地抓好议价，使议价商品做到活而不乱，广州市物价继续上涨的势头才有可能遏止。

（二）对广州物价高问题提出的一些见解。

在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由于物价上涨，特别是副食品价格的全面上升，的确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尤其是给一

部分工资低奖金少，赡养人口多的家庭，造成生活困难，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也有些同志提出，我们既要看到物价上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必须承认，当前物价上涨，是在经济全面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是过去经济建设中，受“左”的错误影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而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暴露。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冲破了过去用行政办法控制供求矛盾、价格矛盾，商品流通渠道堵塞，不能货畅其流的停滞局面。那种旧的虚假的“平衡”状态打破了，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了，商品生产发展了，市场繁荣了。物价问题，正是在突破了旧矛盾，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又尚未完全建立之前出现的问题。

有些同志认为，广州市的物价，除凭证供应牌价商品外，其他商品价格应略高于全省。如广州成为全省价格的“盆地”，则广州商品势必大量外流，广州市民也一样不能得到实惠。

还有些同志认为，只要人民收入的增加超过了物价上升的幅度，物价只在个位数内上升，就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因为价格本来就是一种经济动态，上下波动是正常的。

（三）物价高的原因剖析。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从总的方面说，导致我市主要副食品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供求矛盾，是货币投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商品供应的增长不相适应。就具体原因来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就商品可供量与货币流通量的对比看，广州是商品供应量应最低的地区。一九八一年广州地区货币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例为一比五点九七，大大低于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四年的一比十四。而其它省市都比广州高，如上海一比十五，北京一比十三点四，天津一比九点七。

广州市货币投放大幅度增加，首先是因为出口商品和非贸易外汇收入大量投放了购买力。自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我市对外经济交往迅速发展，外汇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是一件好事。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八年外贸收购产品总值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非贸易外汇增加了两倍。但是外汇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省，而生产出口产品所投放的购买力，和非贸易外汇形成的购买力却留在广州。仅从一九八一年来看，全市出口商品增加，侨汇、外币兑换和回笼的兑换券，市区发展“三来一补”的工缴费，以及引进外资正在兴建的三大宾馆等项目，投放市场的购买力约为八亿元左右，占一九八一年全市发生购买力的百分之二十。据珠江分行的典型调查，侨汇收入大部分用于购买副食品，由于华侨商店供应的商品，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工业品，副食品不足百分之二十，因此，居民手持侨汇用于购买副食品的部分，百分之八十投向农贸市场。加之港澳同胞、华侨、国外旅游者猛增，一九八一年，仅各大宾馆接待的旅游者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七万人天次，其中外宾、华侨、港澳同胞二百八十七万人天次，加上平常回市探亲的港澳同胞，平均每天约有两万人天次，重大节日则更多，如清明节、圣诞节、春节等回市的港澳同胞高达二、三十万人次。他们带回外币，在广州食用、宴请，消费大量的副食品，这就大大增加了对广州市场的压力。其次是由于就业面扩大，工资、奖金增长幅度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幅度。城镇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九十四点七，一九八一年发生的购买力比一九七八年上升了百分之九十点四。比全国各大城市高（沈阳上升八十六点二，武汉上升五十四点三，重庆上升七十三点一，西安上升五十点五）。再次是，在农副产品的采购中，这几年牌价收购下降，而议价收购大量增加，对农村的货币投放也大幅度上升。此外，广州市作为华南大城市，随着经

济的活跃和发展，流动人口和流入的购买力也大量增加，一九八一年货币净流入量即达二点八亿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一倍多。

2，主要副食品自给率低。广州市郊县副食品的生产由于受粮食的制约，自给率不高，生猪自给率仅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一九五六年自给率仅有百分之七点一，均不含地销数）。蛋品自给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一九六五年为百分之三点二）。三鸟的自给能力更低。

3，省内外副食品货源逐年减少，省外货源除生猪有较大增加外，其他都大幅度下降，而且没有保证。六十年代，中央对广州物资的调拨和主要商品的分配，实行“在省的计划中单列出来，同时上报中央，由中央和省共同安排”的体制，副食品供应有比较可靠的保证。从解放后到文革前，广州副食品的货源，一般是省外调入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省内调入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省外调入的副食品，除了猪、禽、蛋外，还有牛羊肉、海鲜品、干果菜等，品种较多。以市场供应情况最好的一九六五年为例，生猪省外调入占全年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三，省内调入占三十四点一，自给百分之十七点八。蛋品省外调入占八十一·七，省内调入占十五点一，自给百分之三点二。但是，一九六六年以后，中央单列的计划供应被取消了。只是近两年来，由于中央照顾，生猪调入才大量增加，一九八一年省外调入一百二十八万担，比一九六五年增加近两倍。家禽一九八一年省外调入只有五万二千只，不到一九六五年的十分之一。蛋品十二万担，比一九六五年减少了将近一半。其余如牛羊肉、干果菜、海鲜品等基本上没有牌价调入。上述调入商品，也视货源情况，货源多时多给，少时少给，均未纳入中央有关部门的正式计划，因此，货源基础非常脆弱，随时有断档的危险。省内调入的副食品也由于派购政策的变动，牌价收

购大量减少，调入广州的副食品也连年完不成计划。生猪一九七九年只完成调入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一九八〇年只完成百分之五十八点六，一九八一年只完成百分之五十。三年来生猪调入计划的未完成部分，共达一百二十五万担。省为了弥补调入不足部分，在一九八〇、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中，共计划调拨饲料粮一亿八千四百万斤，可顶四十六万担生猪调入任务，但至今年九月底，只调入一亿一千四百万斤，尚欠调七千万斤。三鸟一九六五年省内调入五百万只，一九七九年取消派购后，没有调入计划。牌价鲜鱼一九七七年还调进七十九万担，一九八一年下降到三十三万多担，下降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七。其中鲮鱼，一九五五年调进广州的达四十六万担，按当时人口平均社会供应量计算，每人每年有三十多斤，而一九八一年调入广州的鲮鱼下降到二十九万多担，按现在的人平社会供应量计算一年只有十二斤多（除去部队、机关团体外，居民不足八斤）。

4，物价补贴拨款少。由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背离价值，要掌握更多的牌价货源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由于地方财力的限制，用于物价补贴的拨款，又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北京、上海等城市低得更多。北京市一九八一年用于购销价格倒挂，补贴达六亿三千多万元，相当于该市社会商品零售额的百分之十，今年上海用于价格补贴的财政拨款预计可达十二亿元。而广州八一年仅补贴了一亿二千八百万元（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只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百分之三。北京市为了保证牌价蛋品的供应，高进低出，一年就补贴一千多万元。天津、上海市连水果的牌价供应也是补贴的。广州市物价补贴少，也是牌价供应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5，内外贸缺乏统筹安排，受港澳市场影响大。仅从广州市来看，农副产品的出口额很小，只占出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

七、可是全省农副产品的出口量占的比重很大。一九八一年全省外贸实际出口总值为二十点八亿美元，其中农副产品达九点三亿美元，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农副产品的大量出口，不能不影响到国内市场的供应。以鲮鱼为例，佛山鲮鱼产区的五个县，二十一个公社，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〇年间，鲮鱼生产只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七，收购量增加百分之十二点二，而出口量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调入广州市的鲮鱼减少百分之二十。过去全省只负担广州一地的供应，出口数额也甚小，可是现在不仅出口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还供应珠海、深圳两个特区市。加上各地为了赚取外汇，竞相抬价收购农副产品，特别是一些县、市直接插手我市郊县，抬价抢购水果、三鸟以及部分蔬菜出口，给广州市的副食品供应造成很大缺口，无法弥补。

六、在管理上漏洞甚多。国营商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流通环节多，损耗大，费用多，影响零售物价上升。据调查，国营商业经营的香大蕉，从产地到消费者手里要经过四、五个环节，产品要折腾八次，每经过一个环节，即增加一次费用，每折腾一次，产品损耗更大。香大蕉的收购价与零售价之间，一般相差达百分之五十。国营商业在经营议价商品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些单位经营牌价商品的亏损靠搞议价赚钱来弥补，职工福利、奖金靠议价来找出路。于是出现了抬价争购，转手买卖，层层加价，多头插手经营议价商品的现象。与此同时，对集市贸易缺乏严格的管理，使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乘机截拦抢购，转手买卖，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目前在鲜鱼、牛肉、水果等市场都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转手买卖的投机商贩，他们包揽外地来市的鲜鱼、牛肉、水果货源，然后转手批发给个体摊档，使这些商品的地区差价或进销差价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有的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把上面的六个原因综合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广州市副食品价格的畸形偏高，反映出我们在宏观经济的指导上，缺乏有计划的综合平衡。无论对副食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各个环节，对内、外贸的统一合理安排，对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的比例，都缺乏统筹安排，综合平衡。

稳定物价的措施和意见

十二大要求我们今后五年要达到“三个根本好转”。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是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同志们认为，保持广州物价基本稳定，是我们贯彻执行十二大文件的一项重要工作，要经常加以研究，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讨论中，有不少同志提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短期内要把广州的物价明显地降下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综合治理，使总的物价指数按目前的水平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出现大幅度上升（上升幅度在百分之三以下），是有可能而且应当做到的。物价部门的同志根据近半来的观察，初步框算了一下，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全社会商品销售总量增长的前提下，使牌价商品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议价商品占百分之二十，市价商品占百分之五。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和要求，同志们认为，由于广州的特殊地位，市场供应特别是副食品所形成的巨大缺口，只靠广州本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一定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对我市在财力、物力、货源上给予大力支持，并请求中央按一九六二年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文件的规定，把广州所需的商品和物资纳入中央调拨计划。同时，省内调入的商品，按计划调足，不足部分以粮补足或差价补贴，以保证我市平衡

市场所需的牌价商品货源。除此，大家着重讨论了我们在工作上应从五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广州市的物价。

（一）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市场物价管理。

1，要加强牌价商品的管理。对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牌价商品要严格管理，一般不准提价。对其中少数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影响生产和经营者积极性，以致造成市场断档脱销的商品，可分别不同情况作适当调整。这些商品调价后，从表面上看虽然会增加群众一些负担，但比生产者因亏损而不愿生产，有价无货，群众转向购买议价商品会好一些。

2，积极搞好议价商品的经营和管理。许多同志认为，在牌价货源不足的情况下，国营贸易货栈积极办好议价商品的经营和管理，这是平抑物价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证明，凡国营贸易货栈、肉菜市场大量吞吐、经营议价商品，农贸市场的价格就受到抑制。而国营贸易货栈和肉菜市场能否积极经营议价商品，关键在于能否允许突破规定的限价。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是经营议价的猪、禽、蛋、水果等主要农副产品，应允许按照目前经营议价水产品一样，实行浮动季节差价，把作价权下放给主管局掌握。有的同志主张把作价权给专业公司掌握。二是进一步研究办好货栈的问题。比如，为了加强对货栈的领导，可否全市建立一个对贸易货栈的专门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议价商品的经营。一个商店既经营牌价商品又经营议价商品，漏洞甚大，能不能做到分店经营？如何端正货栈的经营思想，改善货栈的经营管理，如何正确处理货栈经营议价商品的盈亏问题，以及职工奖金、福利问题？等等。

3，加强农贸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有的同志主张学习南京、沈阳等地的经验，对农贸市场上市的商品实行最高限价。但也有的同志不主张采用行政限价的办法。关于在农

贸市场开征营业税和所得税问题，多数同志赞成这个办法，但也有的同志担心，只有这一条措施，而没有其他办法跟上去，农贸市场的价格还会提高。为了防止投机倒把分子抬价抢购商品，国营货栈要想法把省内外流入广州市的大部分货源掌握到手。可考虑在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下，开设水产、水果、三鸟等市场交易所，农副产品和土特产进入本市后必须在交易场所内进行交易，禁止场外批发活动。是否可行，还需进一步研究。

4. 国营商业部门要改善经营管理，减少流通环节。

（二）大力组织货源，缓和商品供求矛盾，国营商业、供销社、贸易货栈要进一步搞活经济，继续疏通流通渠道，积极从各方面组织牌价、议价商品货源。

在讨论中，大家还提出，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加强对农民“三兼顾”教育，坚决恢复落实部分农副产品派购任务。并可通过贷款支持、换购、签订购销合同等方式，尽可能更多地把商品收购到手。建议省要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处理好内、外贸收购的关系。许多同志主张，对内外销商品应由省归口部门加强综合平衡。凡是国内紧缺的商品应不出口或少出口，国内外都需要的商品，尽量挤出一点出口，国内有余的商品应力争多出口，要逐步改变出口结构，增加工业品出口比例。对出口商品基地，在资金、奖售和价格上稍为优厚一点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悬殊，以免顾此失彼。有的同志提出，省内应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抬价收购竞相出口的现象，在收购价格、奖售条件和紧缺物资出口限额上，应当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放松计划的平衡工作，听任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那么，广州市的物价，在港澳市场的牵动下，是难以稳定的。

（三）努力搞好郊县农副产品基地建设，逐步提高副食品自给率。

同志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从长远看，解决广州市副食品的供应，要靠自力更生，建设好郊县的副食品基地，提高自给率。实现这一点，一定要进一步坚持和落实城市支援农村，农村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发展副食品生产要采取国营农场、集体办畜牧场和发展重点户、专业户两条腿走路的原则。目前，建设副食品基地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饲料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给予支持，适当减免粮食征购任务，增拨饲料粮，但同时，也应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把外汇用好。建议从明年起，在地方留成外汇中拿出一定数额的外汇进口饲料，或用外汇与内地串换，或用议价收购饲料，采取“高进高出”的办法，支援副食品生产的发展。关于发展副食品基地所需的资金问题，大家认为，除了地方财政和单位自筹解决一些外，要充分发挥农贷的作用。充分利用农贷，就要研究解决贷款的具体政策问题。今后要把重点户专业户纳入全市副食品生产基地范围之内，通过贷款，把他们的产品用合同形式纳入国家收购计划中。此外，为了促进副食品基地的建设和发展，还要稳定和兑现现行副食品的收购和其他有关政策。

（四）控制购买力投放，缩小货币流通量与商品可供量的差距。

为了在我市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缩小货币流通量与商品可供量的差距，大家提出，计划和财政金融部门，要根据物资调拨和主要商品供应状况，控制购买力的投放和加强财政金融的监督工作，并把购买力投放与商品供应纳入市的国民经济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为了控制购买力的投放，要继续控制好奖金。有的同志提出，目前奖金多少带有物价补贴性质，不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考虑把奖金与物价津贴严格区分开来，对近几年广州职工生活费指数上涨超过全国水平部分，按比例发给物价津贴，定期调整。把物价津贴与奖金脱

勾，使奖金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为了搞好货币回笼，还要研究解决增加侨汇商品的供应以及增加其中的副食品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同志提出，除了要求中央供应商品按计划调足外，市华侨公司的利润上缴及留成比例实行单独计算，把经营利润的百分之六十作为补贴扩大副食品经营的亏损。同时，对侨汇购买副食品，实行优惠价与浮动价相结合，部分商品可略高于牌价，低于市价，尽可能把侨汇的回笼纳入计划轨道。为了减少侨汇用于购买副食品的压力，应该发展侨汇建房。并要求中央增加建筑侨汇的地方留成比例。此外，建议商业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尽可能地回笼货币，并注意搞好非商品性货币回笼，对高级消费品实行赊销，组织居民集资兴建住宅或分期付款预售住宅等，以减轻社会购买力对市场的冲击。

（五）继续实行必要的价格补贴，保障居民的利益。

对价格实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这是稳定物价的经济手段之一。多数同志认为，现在对价格继续实行补贴，对稳定居民生活是必要的。但也有些同志认为，目前的财政补贴办法存在不少弊病：一是助长企业的依赖思想，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二是非凭证定量供应商品，财政补贴后出现倒挂，为投机倒把分子所抢购，居民得不到实惠；三是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地人员沾我市居民的利益。为此，要进一步总结现行价格补贴中的经验和问题。价格补贴也要讲求经济效益。